

*shijian fanshi xia de duwei zhexue:
ren zai jingyan shijie zhong de chao yue*

实践范式下的杜威哲学： 人在经验世界中的超越

高来源 著

近年来，杜威的哲学思想在经历了短暂的消沉之后，开始再次受到人们的重视。究其原因，除了美国新实用主义的宣扬之外，更多的还在于其哲学思想对现实世界中人的关照。

实践范式下的杜威哲学： 人在经验世界中的超越

高来源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杜文丽

封面设计：汪 莹

责任校对：张杰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实践范式下的杜威哲学：人在经验世界中的超越 / 高来源 著 .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1

ISBN 978 - 7 - 01 - 015297 - 4

I. ①实… II. ①高… III. ①杜威, J. (1859~1952)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① B71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35796 号

实践范式下的杜威哲学：人在经验世界中的超越

SHIJIAN FANSHI XIA DE DUWEI ZHEXUE: REN ZAI JINGYANSHIJE ZHONG DE CHAOYUE

高来源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6.75

字数：240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15297 - 4 定价：52.5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 65250042

实践哲学的理论分野

丁立群

黑龙江大学哲学院西方实践哲学研究中心

实践哲学的关键词是实践，理解实践哲学的关键是如何理解实践。实践哲学对我们来说，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是因为实践这个概念已经是一个日常生活的普泛性概念。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到处在“实践”着，到处遇到“实践”，实践似乎无处不在。而在哲学研究中，人们提出了种种实践理论、实践哲学，使用了“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实践认识论”“实践人本主义”“科学实践论”等诸多概念。人们提出的每一种理论所使用的“实践”概念都具有不同含义，甚至同一种理论中“实践”的含义也因语境变化而有所不同。以至于“实践”已经成为理论界和日常生活中含义最多样化且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之一。这种泛化的理解或多或少歪曲或者模糊了实践的涵义——正是由于实践概念的普泛化，淹没了实践的本真的意义，使人们谈论实践哲学时往往在概念上缺乏统一性，甚至不知所云。由于实践概念的本真涵义已被湮灭，实践以及实践哲学对于我们来说，又是一个陌生的概念。

实践概念的这种泛化过程特别与一种实践的技术化倾向直接相关，正如 H.G. 伽达默尔所说，近两个世纪以来，人们对实践的最大误解，就是

把实践看作是科学的技术运用。而沿着历史上溯，可以发现，这一过程是一个手艺、技巧和操作、工匠的活动、科学技术即依次逐渐进入实践概念内涵的过程。在古希腊，实践（praxis）是不包含制作（make）之意的。制作是工匠的技术活动，实践是贵族的政治和道德活动。二者无论是在社会阶层上还是在活动主体和活动内容上都是截然不同而分处于不同领域的。然而，在欧洲思想文化的演进过程中，制作对实践却发生了一个渐进的侵袭过程。中世纪，在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中，“实践”概念已经渗入了“制作”的涵义，实践和制作发生了混淆。到了近代，应资本主义生产的需要，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兴起并逐渐取代了实践，产生了技术实践论。实践的技术化实际上就把实践和手艺、技巧和操作联系起来，进而与人们的生活技术、技巧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是实践概念泛化的关键环节，技术、技巧、操作和手艺在生活中具有普遍性，人们常在掌握“生活技巧”的意义上使用实践概念，即通过实际活动习得一种生活技术。实践与此相连涵义就变得复杂而多样，从而逐渐泛化。这就是说，这种泛化的实践概念强调的是操作技术，其核心原型是科学实验。从根源上说，泛化的实践概念是从亚里士多德的“制作”概念逐渐演化过来的。与此相联系，实践哲学也在多重涵义上被使用，其中一个通用的涵义就关于以实验为原型的各种技艺行为的哲学。这首先是由 F. 培根的技术实践论赋意的。

然而，这种涵义并不是实践及实践哲学原初的涵义，甚至从根本上歪曲了实践哲学。所以，实践和实践哲学对我们来说又是陌生的。

因此，有必要追溯一下实践及实践哲学的原初涵义。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首先在哲学意义上研究了实践概念，被公认是实践哲学的创始人，他对实践及实践哲学的理解应当代表了实践哲学的原初意义。

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实践哲学是与理论哲学相对的一种哲学形态。他区分了三种生活方式，即理论的、实践的和制作的，它们分别以三种智慧即理论智慧、实践智慧和技艺为基础。

理论一词通常看来,显然是一个知识论概念。它意味着由概念、判断和推理构成的知识体系。然而,理论在古希腊则是一个宗教概念,它本是奥尔弗斯教的一个词汇,本意为静观、直观、看、沉思、思辨,如对神的直观,观看游戏或参加节日典礼。古希腊城邦派往神庙求取神谕或参加仪式的使者称作“theory”(理论),这是理论一词的派生意义。在毕达哥拉斯哲学中,理论才略具知识论含义,他把数的和谐看作神的体现,人们可以通过数的和谐来认识神。所以,B.罗素认为,通过毕达哥拉斯的思想,“理论就逐渐地获得了它的近代意义。”^①但是,直到近代,理论虽然获得了真正知识学意义,却也并没有完全摆脱其宗教基底。在牛顿物理学中,上帝仍然是一切物理事物背后的第一推动。

理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其根本特征就是它无关功利的非实用性质。在古希腊人看来,自然是一个具有神性的永恒的、不朽的领域,关于这一领域的知识不能与人的现实需要相联系,而是由人类的本性决定的。^②不受现实羁绊,过与现实无关的“纯理论”的生活,这是最高的幸福和理想^③。

由此,我们可以确定理论哲学的本质。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理论哲学包括数学、物理学和神学(形而上学)^④其中,理论哲学的最高形态是神学,而神学即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把理论哲学的知识统称理论智慧(sophia):理论智慧是关于不动不变的永恒必然领域的知识。科学是从一个最终的“始点”推出的必然体系,而这个据以推论的最终“始点”则不是科学所把握的,只能由“努斯”(Nous)把握。他说,掌握理论智慧的

① [英] B.罗素:《西方哲学史》(上),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33页。

② 参见 Aristotle, *Metaphysics*, translated by Hume Lawson-Tancred, Published by Penguin group, 1998, p.4.

③ 在古希腊,科学作为一种理论,是与应用无关的。所以,古埃及实用性的几何学传到古希腊,也变成了无关应用的纯科学,几何学的点、线、面都被抽象化了。

④ 参见 Aristotle, *Metaphysics*, translated by Hume Lawson-Tancred, Published by Penguin group, 1998, p.155.

人不仅知道从“始点”推出过程及其结论，而且确切地知道和掌握这个“始点”。可见，理论智慧作为“努斯”与科学的结合，必然是关于最终问题、掌握最终实体的居首位的科学。^①

与理论处于永恒领域相对，实践与制作则处于变化的领域。亚里士多德在实践与制作的对比中对实践做了论述。

在他看来，实践是一种德性的实现活动，而制作在于依据自然的原理去制作。德性可以泛指一切事物好的品质，它使一个事物的存在状态好并使其实现活动完成得出色。德性可以泛指一切事物好的品质，但是，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所说的德性主要是指人的德性。人的德性则是指一个人的品质好，从而使他出色地完成其实现活动。从另一方面来说，人的德性是一种值得称赞的品质。“善”即是“灵魂的一种合于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②。制作虽然与实践同处于变化的领域，但制作在物事而不在人事。它约略相当于近代的技术，但比技术多一些：古希腊人把艺术放在制作的范畴里。与实践作为人的德性的实现活动不同，制作产生的多数是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的物品。

实践重在于“行”，制作重在于“知”。实践处于变化的社会历史领域，它面对的易变的具体事务。所以，普遍性的认知对实践没有重要的意义；实践是一种道德活动，在道德活动中，个人经常处于一种特殊的境况中，无法靠普遍的原则决定行动。他甚至断言，在实践中，一个没有知识（指普遍知识）的人可以比有知识的人干得更出色，特别是那些有经验的人。^③制作则具有按理性和原理操作的品质，因此，“知”在制作

①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74—175页。

②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2页。

③ 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30页。

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实践和制作依据两种不同的理性。实践的理性是明智，制作的理性是理智。明智与理智两个概念约略相当于价值理性和科技理性。明智又称作实践智慧、实践理性（Phronesis，又译 Prudence）。明智是指立足于特殊性、凭借丰富的生活经验把握和筹划对自身的完整的善。——完整的善是相对于部分的、局部的、片面的“善”，后者只是理智的技巧所为。“理智（Nous）”则指的是科学和技术的理性。理智作为一种科技理性，它和事物的生成有关，它要生成某一种物体，而制作就是去思辨某种可能生成的东西怎样生成。^①

实践是目的内在于自身的活动，制作则是以外在的事物为目的。实践的目的内在于自身首先意味着目的与活动过程是同一的。实践是善的实现活动，善作为实践的目的是贯穿于实践过程中的，在这种意义上，实现活动本身就是目的。其次，实践的目的内在于实践自身意味着实践是目的和手段的同一，即善的实践目的必然凭借善的手段。这种同一性只是到了尼可罗·马基雅维利才被割裂：尼可罗·马基雅维利的一句名言就是，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制作则不存在这种同一关系，因为一种物品的生产可以采取多种工艺途径和手段。

实践是无条件的、自由的活动，制作是有条件的、非自由的活动。无论是伦理行为还是政治行动都是以承认人的自由为前提的。亚里士多德在两个方面规定实践的自由性质：实践是一种自足（autarkeia）的活动，即自我完满不依赖于条件；实践的主体是有充分闲暇时间的自由的贵族阶级。这两方面都符合亚里士多德“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的要求。而制作是一种与物接触的活动，必然受物的制约；而且，它作为一种“为他”的

^① 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26页。

工具性活动，其主体也不具有自由的性质。

上述是亚里士多德对实践的规定。由于实践与制作同处于变化领域，所以，亚里士多德只是在实践与制作的区别中对实践做了论述。但是，总体上，通过对实践的规定以及与制作和理论的对峙关系，我们可以对实践哲学做一个总结。

第一，与理论哲学是关于不变领域的永恒实体的学问不同，实践哲学是关于变化领域的属人的善以及善的实现活动的学说。

第二，与制作是关于变化领域中某种可能生成的东西怎样生成的技艺不同，实践哲学是关于变化领域中的政治和伦理的学说。

第三，与理论哲学是关于超越经验世界的神、永恒性、终极实体的沉思不同，实践哲学是指导人行动的学说，“理论的思考以真理为目的，实践的思考以行为为目的。”^①。

第四，与理论的知识追求真理不同，实践的知识属于意见。“真理”虽然重要却遥不可及，与人类事物不相关联。“意见”却是与人类事物、城邦事务密切相关的。

第五，实践与理论和制作在亚里士多德思想中的截然判分，导致哲学史上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分峙，导致道德实践论与技术实践论的对立。深层中，这实际上是人类完整行为的分裂，是人的存在的分裂。

亚里士多德对实践的描述和对实践哲学的规定以及与理论哲学的比较在哲学史上具有经典意义。此后，西方哲学关于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划分基本上延续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在西方哲学中一般把与形而上学相对的伦理学、道德哲学称作实践哲学，这是一种通行的称谓。

现代新康德主义弗莱堡学派的代表人物 W. 文德尔班在亚里士多德对

^① Aristotle, *Metaphysis*, translated by Huge Lawson-Tancred, Published by Penguin group, 1998, p.44.

实践和实践哲学的规定基础上，从亚里士多德关于实践的自由本性以及实践理性直接导致行动的思想出发，对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研究内容和理论分野进行了划界，进一步概括性的界定了实践哲学。

他认为，对历史进行哲学思考，如果只限于研究存在于各民族的社会历史生活的普遍规律，则属于理论哲学的范畴；但是，由于社会历史是人类有目的的活动领域，所以，如果历史哲学探究的是各民族社会历史生活整体的历史发展目的以及如何实现这种目的，历史哲学问题就属于实践哲学的范畴了，“就人类社会的理想构成历史的基本意义这一点而论，历史哲学，正如上述，也属于这个范畴。”^①由此，可以进一步认为，实践哲学研究的就是为目的所决定的人类活动问题，它包括以此为基本向度的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哲学、法律哲学、历史学、美学和宗教哲学，等等。^②

对实践哲学的这一划界为当代哲学家所认可，O. 赫费认为，“若既从个人层面又从机构性层面对人的行为进行研究，不难发现，伦理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以及法哲学和国家哲学均属于实践哲学。从较为广泛的意义上讲哲学人类学、历史哲学及宗教哲学也属于实践哲学。”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它们的存在取决于人，取决于他的需求及利益、他的希望、期盼以及他的合乎规范的评论。”^③我认为，W. 文德尔班和 O. 赫费对实践哲学的规定是一致的。而他们对实践哲学的规定也与亚里士多德对实践哲学的描述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首先，W. 文德尔班和 O. 赫费实际上扩大了实践哲学的范围。在他们看来，从导致人的行动的理论这种意义出发，实践哲学在外延上更广泛，不仅包括政治哲学和伦理学（亚里士多德），而且包

① [德] W. 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31、32—33 页。

② [德] W. 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32—33 页。

③ 参见 [德] O. 赫费：《实践哲学——亚里士多德模式》，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年，“前言”。

括心理学、社会哲学、法律哲学、历史学、美学和宗教哲学等学科，这实际上几乎包括了整个人文科学。可以看出，W. 文德尔班所说的实践哲学实际上具有一种分类原则的意义，他只是把属于实践哲学的所有科目归纳在一起。这种分类原则并没分清实践科学和实践哲学。但这种外延的扩大就为后来伽达默尔区别实践哲学与实践科学（人文科学）两个层面奠定了基础。其次，W. 文德尔班对整个形而上学（理论哲学）进行了一种实践哲学的转换。他指出，以往哲学总是在形而上学理论中探索哲学的核心，把与形而上学相关的自然科学作为研究对象，很少以变化的历史作为研究对象。但是，“哲学对于其他文化活动的关系并不比哲学对各门科学的关系更不密切，因为从宗教、伦理、艺术各种生活而来的概念，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而来的概念，与从科学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一道，一股脑儿地拥进带有形而上学倾向的哲学所欲形成的宇宙观念中来，而理性的价值规定（Wertbestimmungen）和判断标准还更强烈地要求在那种观念中取得地位，那种观念愈益成为哲学实践意义的基础这种要求就愈益强烈。”^① 这就明确指出形而上学存在着固有的实践哲学的内容，而且这个内容在形而上学的发展中日益具有主导地位 and 基础地位。可以看出，W. 文德尔班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预见了现代哲学的实践哲学转向。

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实践哲学有几个发展趋向值得我们注意，这些趋向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实践哲学的意义。

一、科学技术与实践的统一：对自然的伦理与诠释问题

如前所述，在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中，实践与理论和制作是三种不同

^① [德] W. 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12、14 页。

的生活方式，三者在诸多方面性质都是截然不同的。到了近代，当理论由古希腊的宗教概念逐渐演变为知识概念，制作由工匠的手艺演变为技术与科学理论相结合，便产生了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但是，这种发展也使人们产生了一种幻觉，仿佛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从而产生了唯科学主义这种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的产物。在理论上，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使得自近代（主要指 F. 培根和 G. 伽利略）以来以，“实验”和“技术”代替实践的理论倾向得以完成；同时，在现实中，现代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运行导致了诸多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危机。这一切引起现代思想家对科学技术进行反思，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进行批判。诸如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技术理性批判；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以及技术哲学和技术伦理学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生态破坏和人的压抑的批判。在这种反思批判的过程中，人们渐渐认识到，亚里士多德把实践与理论和制作的分列对峙，作为三种漠不相关的生活方式和认知方式来对待，实质上是把科学和技术作为独立于人类实践领域的自主活动，超越于实践的规约——这正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的根本原因。正是出于这种考虑，H.G. 伽达默尔提出了解释学对自然科学的意义问题，即解释学的普遍性问题。解释学的普遍性就是实践哲学的普遍性^①，正如 R.J. 伯恩斯坦所指出的，“科学中解释学维度的恢复是以一种实践—道德的关注为基础的，这种关注力图根除仍很流行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各种形式，为‘学习’不同而陌生的事物和为恢复实践智慧概念的完整性开拓一个广阔空间。”^②实际上，T. 库恩在把科学革命中新范式选择的原因归结为社会历史因素时，

① 笔者认为 H.G.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就是其实践哲学，二者是统一的。故不存在其思想发展中有一个所谓“实践哲学转向”的问题。

② R.J. 伯恩斯坦：《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郭小平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18 页。

他已经把科学的革命性变化的根源追溯到实践哲学领域了，这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科学的解释学问题。所以，R.J. 伯恩斯坦认为，现代实践哲学已经无法回避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关系，他仿照康德的表达形式表达了二者的关系：“没有智慧^① 技术便是盲目的，没有技术智慧便是空洞的。”^② 如果考虑现代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联姻关系，这个表述对于现代科学同样适用。这就一改亚里士多德传统，把科学技术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实践哲学的思考范围，避免了科学技术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同时，也使我们在本真意义上，恢复了古希腊哲学中自然的“善”的维度，这是自然目的论的真正意义^③。

二、实践科学与实践哲学的区分：人文科学知识形态研究

近代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精神科学）是在古希腊文化基础上诞生的一对双胞胎。其中，自然科学首先以其对生产力的强力促进和巨大的社会效应而日臻成熟。但是，人文科学的理论却一直由于缺乏确定性而被拒斥在严格意义的知识之外。所以，18 世纪以来，关于人文科学知识形态的基础与合法性的探索就一直没有中断，在这一探索中，人文科学的特殊性及其与自然科学的区别逐渐明确。F. 施莱尔马赫以生命体验和泛神论内在融合的解释学，已经使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认识论拉开了一定的距离。W. 狄尔泰进一步将科学的基本原则和生命哲学的基本原则综合起来，寻找人文科学的特殊方法。H.G. 伽达默尔批判地继承了这些思想，他赞

① 这里的“智慧”是指“实践智慧”。

② R.J. 伯恩斯坦：《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郭小平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04 页。

③ 古希腊的自然目的论即是“制作”目的论的隐喻形式。

同亚里斯多德把实践知识作为与理论知识（科学知识）、制作知识相区别的另一类特殊的知识思想，提出了人文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形态的合法性问题，并试图在实践哲学的基础上解决这一问题。

在他看来，实践哲学即奠定了人文科学的基础。实践智慧本质上，就是在美德和善的目标下，把特殊性和普遍性结合起来。而解释学和人文科学（精神科学）的本质即在于此。W. 狄尔泰把理解者和理解对象（如，历史的理解者与历史）的同一性作为人文科学的基础，H.G. 伽达默尔对此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历史显然具有一种更为深刻的“相异性”，因而，同一性不是绝对的，是有界限的——这就是相对于无限的理解任务和无限的真理，人的时间性和有限性。由此，理解才是必要的——理解是人的存在方式。

自然科学的理想是客观性，与此不同，人文科学具有本质性的性质就是和对象的先在关系，这是一种内在的参与关系。在人文科学中，衡量其学说有无内容和价值的标准，就是参与到由历史和艺术构建起来的人类经验的基本陈述中。理解就是特殊经验和文本与人类基本经验的作用过程。伽达默尔把亚里士多德关于实践智慧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结合，转换为一种解释学循环，认为人文科学本质上即是个体经验与人类普遍经验的融合——这体现了人文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的特殊性。^①正是在这种视域融合中，我们可以通过自身体验的直接性和不可替代性证明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人文科学的真理——这种真理不能在普遍的陈述或知识中得到证明。^②人文科学真理及其意义就是在人们无限的诠释中不断被“解蔽”的。所以，“正是亚里斯多德的实践哲学——而不是近代的方法概念和科学概

① 参见 H.G. Gadamer, *Praise of Theory*, chapter 4,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② [德] H.G.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补充和索引》，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第 586 页。

念——才为精神科学合适的自我理解提供了唯一有承载力的模式。”^①H.G. 伽达默尔继 I. 康德回答自然科学的基础问题之后，批判地继承了前人探索的思想资源，试图解决人文科学的合法性基础。这一方面，对人文科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形式，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研究，提出了独特的思想；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他区别了实践哲学和人文科学两个层面。尽管 H.G. 伽达默尔在论述中经常把实践哲学（practical philosophy）和实践科学（practical science）混而用之，我们如果不采取形式的考察方式，而采用实质的考察方式，H.G. 伽达默尔实际上是把整个人文科学（历史和艺术经验是其典型形式的经验形式）看作是实践哲学的体现形式和表现形态，实践哲学则成为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基本原理以及研究范式。如此，按照通常对哲学和科学存在层面的理解，我们完全可以把人文科学称作实践科学，把它的方法论基础、基本原理以及研究范式称作实践哲学。

三、现代哲学的实践转向：理论智慧还是实践智慧

现代西方哲学的实践哲学转向主要体现在为，现代哲学对实践哲学问题及其意义的凸显以及对传统形而上学本身及其传统问题的批判。这种转换实际上是哲学范式的转换。

现代西方哲学把传统哲学所忽略的实践问题凸显出来。从对传统哲学主客二元论思维方式的批判到对前认识的“生活世界”的重视，从对科技理性的批判到对价值理性的弘扬，从对“普遍性”的虚无化到对绝对自由的强调。如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实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

^① [德] H.G.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补充和索引》，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第 386 页。

学、生态哲学无一不具有实践哲学的特征。即使是分析哲学这种偏于技术化的哲学，也在其发展演化过程中，逐渐承认“生活方式”对概念、命题以及语词意义的决定作用。

西方现代哲学不仅在研究主题发生了一个根本的转换，而且，从根本上对形而上学做了一次根本性的实践哲学重构。

如前述，在德国哲学家 W. 文德尔班的理解中，形而上学（理论哲学的典型形式）存在着固有的实践哲学的内容，而且这重实践哲学内容在形而上学中日益具有主导地位 and 基础地位。与 W. 文德尔班同时代略晚，美国哲学家 J. 杜威明确指出，形而上学并不像以往哲学家断言的那样，是发端于理性、惊奇等与价值无涉的公正客观的源头，它有着先天既定的宗旨和使命，形而上学的主要任务恰恰“是要在合理的基础上辩护所继承的信念和传统习惯的精神。”^① 因此，形而上学从根本上是与信念、传统习惯、传统价值以及最终的善这些实践问题连接在一起的，正是这些问题构成了形而上学本质内容。正是基于这种分析，杜威得出了与马克思主义相同的结论：哲学是具有党派性的。J. 杜威就从哲学的起源中，揭示了形而上学内涵的实践哲学的本质精神，以此，确立一种取代形而上学之理论哲学立场的以文化、人文、历史和伦理为内涵的实践哲学立场。^② 这就从根本上把形而上学的内涵置换为实践哲学的内涵。

当代美国哲学家、新实用主义者 R. 罗蒂追随 J. 杜威思想，对哲学（philosophy）的“爱智慧”概念进行了实践哲学的置换。在他看来，哲学是爱智慧，但是，传统哲学即形而上学理解的智慧是理论（theory）智慧，理论智慧在于把握普遍的真理，而真理在于对自然的正确表象。而他认为，这一切完全是人类的自我安慰，尼采称之为“形而上学的慰藉”。实

① 参见 [美] J. 杜威：《哲学的改造》，许崇清译，商务印书馆 1989 年版，第 10 页。

② 参见 [美] J. 杜威：《哲学的改造》，许崇清译，商务印书馆 1989 年版，第 13—14。

用主义的理论已经完全破除了这种“形而上学的慰藉”，实用主义不承认有“真理”，只承认价值。因此，智慧一词应当改变涵义，由原来的理论智慧变为实践智慧。这里的实践智慧可以指谓在实践中，人类生活中自我和他者、个人自由和公共规则之间的一种平衡，“成为智慧的，就是在我们的各种独特幻想和我们与其他人之间的交道之间，在我们就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讲的语言和我们就我们与他人共同的关怀、对他人讲的语言之间，寻找某种平衡。”^①这种平衡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私域与公域的平衡。关于个人话语和公共话语的关系。R. 罗蒂又提出了“种族中心主义”理论来进一步说明。他认为，每个人都是从已有的信念及其网络出发理解一种陌生的话语，这种已有的信念及其网络来源于个体和群族的经验，因而是种族中心主义的。同时，每个人既有的信念网络又不是一个封闭系统，而是对他者开放的。因而，对话同时也是通过他者的信念重新编织我们的信念及其网络系统，超越种族和自我。但 R. 罗蒂指出，对话并不是为了取得思想的一致，获得公认的真理，而是为了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②

综上，我认为，R. 罗蒂的所谓“智慧”，实际上就是生活实践的知识，即实践智慧(Phronesis)。亚里斯多德把哲学称之为“爱智慧”(philosophy)。但是，传统哲学把关注点主要集中于理论智慧上，所以，所谓“爱智慧”实际上是“爱理论智慧”。爱理论智慧在古希腊的语境中，就是偏好于探究世界的“始基”和超验“实体”，这种理论在哲学传统中即“形而上学”。换言之，传统哲学是以探究世界本体的“理论智慧”为核心的。这种形而上学自产生之日起就为怀疑主义、经验论哲学乃至康德哲学所质疑，逐渐失去了意义。所以，“形而上学终结”的口号一再被人们提出，是有其合法性的。在这一背景下，W. 文德尔班、J. 杜威和 R. 罗蒂等思想家提出形

① [美] R. 罗蒂：《实用主义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37 页。

② 参见 [美] R. 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2 年版。